

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湖北人民出版社

“新四军”“四海宾归”王旗南进文从国圣，旗帜黑红文生会驻又授。
“革命军长直掌正直武军”。业奉文生会并不置不施，“纵飞箭全
讲卦众籍柔同。环长半弱而因乘而革对以弱民批呼而群出大
全驻人（此益微乎）奉命革兵嫌都督革联因革而革更风晴性批安
其处一振，真雷震郊革灵气击其旗衣首，平叛此然然要策固
之“结”，常把关在“迷城”的人引上一途。斯步斯得气于丁固
附

禁·青

密每个一拍来出令会添得由升者五显。”“带渐”即也，聘青
氏（聘官职）聘渐游医炮，聘渐游平秉聚遂大奇口因。寒庄会聘
好渐游渐“医病山处游渐口”。“聘渐”矣“聘渐”将丈演田，业
与渐且授生的渐苗峰渐不近外障古北。渐渐移渐游渐渐
而又旋须圆，前须圆。改装渐天邦渐出渐渐大学渐失，聘土渐
时参五渐齐；渐渐游渐渐生渐，真如真重渐渐青果熟百农事。渐渐游渐
而经冬起明道有渐渐渐渐男人渐游，而渐渐。渐代荣金黄知燕
保为可期的极化。

子·風·詩

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以王凤吉集权派同伙倒行逆施、一派胡言煽立身乱谷
兵作“帮帮虽博殊大病”为题，揭露在
大学《姚平洋》耳畔，渐阳小印刷厂印刷
批评、破坏活动。他长期和国民党分子保持联系，暗藏在革
命队伍中达二十多年。统一书号：3106·592 定价：0.15元

1977年6月第1版 1977年6月第1次印刷

目 录

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评论员(1)

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

——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组(9)

卖身投敌的大叛徒江青

.....杭州大学中文系大批判组(19)

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28)

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

.....周 欣(41)

盖不住的丑史 抹不掉的罪证

——揭露“四人帮”相互包庇，销毁反革

命历史材料，杀人灭口的罪恶阴谋公安部批判组(55)

揭露“四人帮”罪恶历史的若干资料和有关名词解释

.....(63)

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评论员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究竟是什么人？“四人帮”究竟是一伙什么东西？

长期以来，他们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利用了所有舆论工具，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吹嘘他们不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文艺革命的“旗手”，而且有一部“出身清白”、“一贯革命”的光荣历史。现在真相大白了。六个多月来，党中央遵循毛主席教导的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政治历史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审查。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总之，他们是一伙反革命，而张春桥和江青还是由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双料反革命。“四人帮”就是由这样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早在三十年代初，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张春桥，在济南上中学时，就充当国民党特务，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使六名革命青年受迫害，其中一名牺牲在狱中。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骨干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三七年秋，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指令下，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接着又采取隐瞒反革命历史和反革命家庭社会关系，欺骗党组织的手法，钻进了共产党。

地主家庭出身的江青也是在三十年代开始她的反革命政治生涯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她加入共产党，不久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三三年秋她又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不久自首叛变，从狗洞里爬了出来。接着她也结识了崔万秋，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崔万秋曾在反动报刊上对她进行肉麻吹捧。江青大演“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积极参加了“购机祝寿”的活动，为国民党效劳，向蒋介石献媚。一九三七年，她与另一个叛徒订立攻守同盟，混入延安，隐瞒自首叛

变的历史，由这个叛徒出面做了假证明，钻入党内。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一九三四年叛党出狱的，以后就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领导下充当文化特务。姚文元小时就深受徐恩曾和他的老婆叛徒费侠的喜爱，当了徐恩曾这个大特务头子的干儿子。以后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直到徐恩曾夫妇逃到台湾。一九四八年上海解放前夕，姚文元隐瞒了他父亲的叛徒、特务身份和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隐瞒了自己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混进党内。解放后，姚蓬子坚持反动立场，反共反人民，于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姚文元竭力包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利用窃取的权力，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勾结王洪文、张春桥千方百计包庇姚蓬子，使他得以逃避党和人民群众的审查。长期以来，姚文元一直同姚蓬子保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一九六九年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还继承了姚蓬子除存款外的全部家产。“四人帮”的党羽所大肆鼓吹的所谓“姚文元道路”，就是这么回事。

王洪文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参过军，当过工人，但他在部队和工厂时就表现不好，作风不正。他不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改造世界观。在上海时经常和一些四类分子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流氓习气严重。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在上海拉了一帮“小兄弟”，搞特务活动，结帮营私。特别是他同张春桥、

江青、姚文元勾结到一起之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恶性膨胀，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疯狂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终于走上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他利用窃取的职权，大量贪污盗窃，挥霍国家财产，生活腐朽糜烂。王洪文是一个吸工人血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一个正在走的走资派。

这就是号称“左派”、“激进派”的王张江姚的真实面目。

“四人帮”崛起和覆灭的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越是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越是要钻到无产阶级内部来，采取“从内里蛀空”的战术。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其真象掩盖起来。“四人帮”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在“抓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大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来说，革命的口号不过是他们搞反革命的一种策略，一种伪装。几个月来对他们篡党夺权和祸国殃民罪行的揭发和批判，已经把他们的“左派”假面具撕得粉碎，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狰狞嘴脸。现在，揭开他们的老底，弄清他们的过去，对于他们为什么一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对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那样刻骨仇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什么不择手段地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挑动武斗，全面内战，等等，这一切难以常情加以解释的问题，就更加得到合理的解释了。他们本来就是反革命营垒中的人物，是以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为任务的。什么“左派”、“激进派”！他们是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派，是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

“四人帮”把自己打扮成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大造舆论，欺世盗名，捞取政治资本。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及其主要成员陈伯达等人，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搅乱阶级阵线，混淆两类矛盾，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以便他们浑水摸鱼，乱中夺权。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他们哪里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他们是窃取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扒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四人帮”自称“站在先进分子一边”，“依靠造反派”。他们所谓的“先进分子”和“造反派”是什么人？他们网罗了一大批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

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他们把这些人封为“反潮流”的“先进分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对于这些人，不是党员的，突击入党；没有当官的，突击提干。他们绝不是那种一般地拉山头，搞宗派，而是建立了一个反革命黑帮。他们有他们的帮中央，有大老板，有军师，有司令，有宣传部长，有舆论工具，有情报系统，有基地，有特务联络据点。他们的黑手插进了中央的一些部门和一些省市机关，他们还搞“第二武装”。总之，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纲领，有路线，有组织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尽管他们在八亿人民中只是极其孤立的一小撮，但能量很大，不可低估，其流毒之广，为祸之烈，影响之深，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恶历史的揭发材料，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它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

级。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确确实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揭露了一批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在斗争中不断地纯洁了我们的队伍。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也确有极少数伪装得很巧妙，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长期没有被我们识破。这种事实，过去有，今后也还会有。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终将被我们党和人民群众揭露出来，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与林彪、陈伯达一伙相勾结，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他们秘密转移、大量销毁他们反革命历史的罪证。他们还秘密组织人，伪装红卫兵，查抄知情人的家，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逮捕知情人，长期关押，残酷迫害，直到杀人灭口。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大量的人证物证还是找出来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四人帮”那些毁灭罪证的伎俩，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无比正确，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实践的意义重大深远，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证明我们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尽管王张江姚“四人帮”已被打倒，但是我们要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要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全部揭发，把“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谬论彻底批臭，把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件件、一桩桩查清，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查清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和事，绝不能手软，坚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通过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任务，促进生产，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和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广大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激发起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组织起来，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让我们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抓纲治国，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把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五期）

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

——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

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组

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指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丑恶历史说明，他们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四十多年来，一直披着“进步”“革命”的伪装，隐藏在革命阵营的内部，从事反革命的罪恶勾当。但是，不管他伪装得多么巧妙，钻得多么深，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面前，在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中，这个阴险狡猾的家伙，终于现出了原形。

—

张春桥是从三十年代开始他的反革命政治生涯的。他曾一再声称，他是三十年代传播“新文化运动的种子、救亡运动的种子”的“文化人”。事实真是如此吗？否！现已查明，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张春桥，早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就和复兴社特务鬼混在一起，充当国民党密探，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他表面上参加进步学生运

动，甚至写文章大讲“抗日爱国”，暗地里却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由于张春桥的告密，六个进步学生横遭迫害，其中一人遭到严刑拷打，牺牲在狱中。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伙同复兴社特务分子，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特务组织“华蒂社”，成为“华蒂社”的骨干分子。他还在由复兴社出资创办的《华蒂》月刊及其他报刊上进行反动宣传。

一九三五年张春桥一到上海，就同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酒肉与共的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搭上了关系，并在崔万秋的指使下，充当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马前卒，围攻鲁迅的急先锋。一九三六年三月，张春桥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化名“狄克”发表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攻击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当鲁迅义正词严地进行还击以后，他又装成受害而可怜的样子给鲁迅写信，表白他的“好心”。但是他在暗地里却继续恶毒诽谤鲁迅。后来又和田汉等人沆瀣一气，鼓吹以“国防文学”为口号的投降主义路线，从背后向鲁迅刺去。

张春桥在上海的那一段时间里，写了许多反动文章，污蔑共产党，而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却极尽美化歌颂之能事。他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大唱赞歌，鼓吹“在政府底统一指挥下抗战”，谁如果不听“指挥”，便是“托罗斯基”，便是“日本帝国主义派来的别动队”。在鲁迅对他们的投降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有力的揭露以后，张春桥又以守为攻，跟叛徒、托派、政治骗子陈伯达的“休战论”相呼应，提出要“使这论争早日结束”，妄图抹杀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并把他们破坏团结抗日的责任推卸到革命人民身上。

张春桥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写文章攻击鲁迅，化名“狄克”，给鲁迅写信，也不敢用真名实姓，甚至连通信地址也要由《大晚报》转，仿佛攻击鲁迅的是狄克，而不是张春桥。张春桥用真名发表文章，却对鲁迅装得毕恭毕敬，什么你是我的“良师”呀，我是你的“伙伴和儿女”呀，应有尽有。在鲁迅逝世的时候，他居然假惺惺地抢着去吊唁，并且写了“纪念”文章《先行者，你安息吧》。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六天，他还借纪念鲁迅为名写了《速写红萝卜》，煞有介事地骂那种“摇身一变，化个名儿”的两面派是红皮白心的“红萝卜”。但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个月，他与另一个特务在国民党的反共杂志上发表了剧本《匪区之夜》，咬牙切齿地骂共产党是“共匪”，是“刽子手”，明目张胆地叫嚣去“杀共匪”，去跟共产党“拚”。这恰好证明，张春桥自己才是个货真价实的红皮白心的“红萝卜”。这个对共产党、对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张春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文化人”，干的是什么勾当，还不十分清楚吗！

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离开上海，返回济南，按照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指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当时，全国抗战已经爆发，大批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延安，张春桥发表文章进行破坏，要青年们“不用去延安了”。而他自己却在复兴社特务的掩护下，披上济南市警察局长送给他的大衣，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后来钻进了共产党。

长期以来，张春桥一直千方百计地隐瞒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极力包庇他的反革命父亲和叛徒、特务老婆。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利用他窃取的一部分权力，极力搜缴和销毁有关

他政治历史问题的材料，并对了解他丑恶历史的人，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残酷地加以迫害，甚至把敢于揭露他的革命群众，打成“现行反革命”，阴险毒辣，令人发指。

二

解放以来，张春桥这个惯于耍两面派手法的家伙，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肆贩卖修正主义，干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勾当。

张春桥竭力追随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石家庄解放没几天，主编《新石门日报》的张春桥就在报上鼓吹什么“贫民当家”，“贫民作主”，就是不提依靠工人阶级。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张春桥对此置若罔闻，而对刘少奇宣扬的“不要认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的反动论调却心领神会，更露骨地叫嚷什么“工人阶级是未必能依靠的”。全国土改完成以后，毛主席又及时指出全党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并批驳了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的谬论。张春桥却在他把持的上海《解放日报》上，抛出了《要发家，种棉花》的社论和其它专题版面，与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大肆鼓吹刘少奇“发家致富”的富农路线。当时有人向他提出异议：列宁不是提出过小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吗？张春桥当即回答：“中国情况不同，……用不着宣传列宁的这个指示”。他公然反对列宁和毛主席的指示，这和他宣扬“要好好向刘少奇学习”一对照，他爱谁，恨谁，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一九五三年“新三反运动”时，张春桥利用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来打击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提出“不要拍苍蝇，要抓大牛”的反党口号。在他所把持的报纸和刊物上，几乎每天要点名批判一两个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或者捕风捉影，或者无中生有，制造了好几起假案。当时负责华东和上海工作的陈毅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当众批判了他。陈毅同志愤怒地说：“报纸是一把刀子，朝敌人身上砍，越锋利越好，砍了自己的同志是要伤骨肉的。”陈毅同志严厉地质问张春桥：“刀子究竟对着谁！”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的险恶用心。他不得不作个假检查以蒙混过去。

张春桥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大右派。一九五四年他和他的“老朋友”邓拓一起到苏联去了一次，回国后立刻成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个应声虫。他竭力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说什么我们国家同苏联、美国比起来，“民主自由太少了”。张春桥在为谁争“民主自由”呢？当然是地主资产阶级，是他的右派同伙。他公然提出新闻事业要“独立工作”、“独立思考”、“独立负责”。左一个“独立”，右一个“独立”，说穿了，就是要使新闻事业脱离党的领导，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向无产阶级进攻。他还公然煽动作家要“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号召”他们去寻找“提篮桥监狱里还关着”的“大人物”、“刽子手”，与“三教九流”交朋友。他攻击肃反运动过“左”，主张“把有问题的人找来，摆出茶点招待一下，谈一谈”，就算了。因此，当时上海有些反动分子感激涕零地向他欢呼：“张青天！”这个“张青天”究竟是为谁撑腰打气，代表谁的利益？答案不是很清楚了吗？

张春桥这个狡猾的敌人，凭着他的反革命嗅觉，很善于窥

测方向，要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进行政治投机，并且在反革命活动中，总结了一套“凡事左三分”的反革命策略，用以欺骗别人，以售其奸。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个写了不少右派文章的家伙，在听到一些风声后，立刻抢先发表了几篇措词激烈的“反右”文章，掩盖他的反革命面目。一九五八年，他听到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指示，又抢先写出了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发表前，有的同志批评他不应当把按劳分配原则说得一无是处，他拒不改动。后来他又跑到陈伯达那里去，炮制大刮“共产风”的理论依据。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对他们这帮所谓“理论家们”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坚决制止了“共产风”。

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给张春桥和他所代表的反动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张春桥怀着剥削阶级的仇恨心理和政治赌徒的投机欲望，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浑水摸鱼，投机钻营，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张春桥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两面派。他本来是“三家村”黑帮的同党，听到批判的风声，就派人给“三家村”的黑掌柜送情报，还说什么“邓拓是我老朋友了，不打个招呼，他会说我不够交情”，与此同时，他又抓起批《海瑞罢官》的旗帜，装成了批判“三家村”的好汉。他本来是刘少奇的一个忠实追随者，一直吹捧刘少奇是什么“中国革命几十年，几千万人流血牺牲”才培养出来的“领袖”，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一下子又把自己打扮成早就同刘少奇作斗争的“老冤家”。他明明是林彪的同